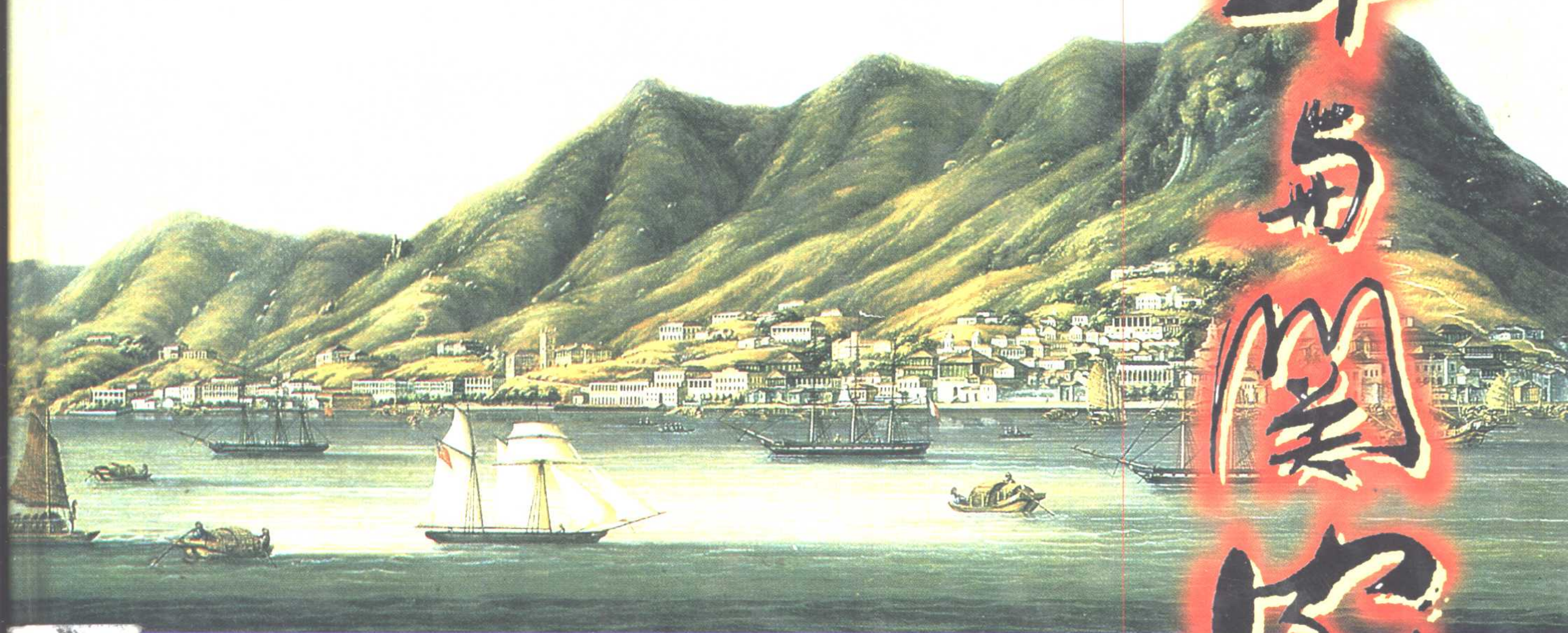


香港開埠與關家



關肇碩、容應莢 著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3
N93
658

Σ
023
—

香港開埠與國家



關肇碩、容應莢 著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一九九七年六月廿四日

CA

香港開埠與關家

關肇碩 容應莧著

出版：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Wide Angle Press Ltd.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197號八樓

7/F., 195-197, Johnston Rd., Wanchai, H.K.

Tel: 25753877, 25757709 Fax: (852)28381079

發行：香港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Lee Yuen Subscription Agencies Ltd.

九龍旺角洗衣街245－251號地下

電話：23818251－4 傳真：(852)23971519

承印：太平洋(永航)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1997年5月初版

定價：港幣100元

書號：ISBN 962－226－409－3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 錄

李序	1
一、香港開埠與關家	容應莢
——基督教之傳播與關元昌一族	
「吃教」與「崇洋」	5
關氏一族的源流	6
關元昌（1832—1912）	7
關黎氏（1840—1902）	11
關元昌的子女	13
關元昌一族的社會關係	15
關氏族人與醫學界	18
關氏一族與改革運動	21
發展和擴散——關元昌的第三代	24
結論	27
圖錄(一)	31
二、中華牙醫之父與國父孫中山（附錄一）	關肇碩
序言	45
飲水思源	47
祖父元昌公小史	48
祖母黎氏太夫人小史	49
簡述各叔伯兄長生平	50
香港西醫書院時代的國父與關、楊兩家族	53
回憶父親楊鶴齡	56

三、回憶一束（附錄二）

關頌姚

序言	62
祖父、母	63
二伯父、母	65
七叔父	66
八姑姐	67
九叔、孀	69
十二叔	71
十三叔	74
我父親	77
我母親	80

四、自立軍起義前後的容閔與康梁（附錄三）

容應萸

一、孫中山、容閔、容星橋	85
二、從《井上雅二日記》看容閔和自立會	87
三、「借勤王以與民政」：孫、梁的折衷點	90
四、參與自立軍聯合的各派	93
五、改革派的聯合	97
圖錄(一)	104
關元昌公支派世系圖	123

李 序

一九九七年是香港歷史性重要的時刻，此因為英國政府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後，將所管治一百五十五年的香港殖民地，交回中國統轄。在主權轉折的關鍵上，涉及六百多萬港人未來的命運和前途生計，成為舉世矚目的事件。但一九九七年對於中國基督教會說來，同樣是一個重要的年份，由於基督教第一位來華傳教的馬禮遜牧師（Rev. Robert Morrison）是在一八〇七年九月七日到達廣州，開始他在華的播道事業。英國政府在香港這塊殖民地經營一百五十五年以來，在本地的建設上，無論政治、教育、商業、法律、文化、軍事等事務，均有不少的成效，而此種成效更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以致對近代中國作出不少的影響和貢獻。

論及香港一百五十五年的發展過程，則不能忽略基督教會歷年在香港興辦傳教、教育、出版、醫療種種的事業；以及基督教徒在社會所參與的活動，致使香港在每一個時代有穩定性的發展。所以研究香港歷史，更需要對香港基督教會史有深度的認識，才能體會到香港歷史的底蘊。香港雖說是中國南方最爾的小島，基於英國的統治，在英國法律所賦予的自由，香港不但成為歐美外國人士進入中國的踏腳石；並且香港亦是國內人士逃避災亂的避難所；更是國人通往外國主要的渠道。尤其在一八六〇年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滿清只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岸對外通商，依據一八四四年中美簽訂的望廈條約；中法簽訂的黃埔條約；一八四五年中英簽訂上海租地章程；一八四七年中瑞挪簽訂的五口通商章程，西方傳教士的活動，是以五商口岸範圍作規限，其他中國內地城市鄉鎮是嚴禁進入佈道，當被官方發現，必然驅逐離境。其間雖然有一些外國教士從五商埠潛入隣近城鄉活動，但屬於居無定所流動性的工作。事實上五口開放初期，各地華人對西教士傳揚的基督教甚為抗拒，所以基督教士在內地難以立足。

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因此歐美傳道會要在廣州，以及其後在廣東和中國南方各省進行傳道工作，西方傳道會多在香港設立宣教

站，使所遣派的西教士在未進入中國之前有地居留，以此在港學習中國文字和各地方言。及至進入內地傳道的西教士，每遇地方不靖、發生教亂、風雨天災、身體患病；回國述職等種種情況，多返回香港避難、醫病和等候船期，所以香港是成為歐美教士重要的集散地。

在一八四一年中英發生鴉片戰爭之際，英國代表義律引用和欽差大臣琦善簽訂的穿鼻條約，於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開始佔領香港島，頒佈香港為英國的殖民地，翌年三月便有美國浸信傳道會教士叔未士牧師夫婦（Rev. & Mrs. Jehu Lewis Shuck）、羅孝全牧師（Rev. Issachar Jacob Roberts）自澳門遷來香港傳教，隨後購置地段興建房舍，開設教堂。倫敦傳道會馬六甲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牧師（Rev. James Legge）於一八四三年十一月遷校香港，而倫敦傳道會原由馬禮遜牧師在澳門興辦的醫療事業、出版事業，亦遷到香港英華書院；至於其後廣州和廣東境內一切傳教工作，均由設在英華書院的倫敦傳道會統一管理和支配。繼有美國公理會（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又稱美部會）；美國聖公會（The 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ary Society）；巴勉傳道會（The Barman Missionary Society，後稱禮賢會）；巴色傳道會（The 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t Basle，後稱崇真會）；巴陵傳道會（The Berlin Missionary Society，後稱巴陵信義會）；惠師禮傳道會（The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後稱循道公會）等教士先後接踵而至，在港學習中國語文，對中國民風習慣有所認識，然後便進入中國內地工作。在十九世紀末葉，中國內地不時發生排外反教的事件；甚至列強多次在中國境內發動侵略戰爭，教會教士多受牽連，以使不少西教士逃來香港避難。所以由於西方教士在香港的來往，對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產生極大的作用。

香港雖然不是歐美傳道會工作主要的地點，但由於倫敦傳道會、公理會、聖公會、浸信會、禮賢會、崇真會、惠師禮會在香港購有樓房物業作宣教站，在港教士又要關心香港華人社區發展，因利成便設立教會，展開華人傳道工作。香港開埠初期，華人多屬勞工階層，民風未開，對福音傳播難被接受。各傳道會教士為使工作得以開展，故多以開辦學校，作為接觸兒童導引。正因為教會興辦現代教育事業，無形將西方科學知識、英國語文傳播於香港社會，使不少青少年接受到西方文明的教育，以致促進近代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就晚清的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運動，與香港基督教會的教育事業均有密切的關係。

香港基督教會在十九世紀興辦的教育事業、醫療事業、出版事業，對中國近代文明肯定有積極性的貢獻，而這些事業的影響是既深且遠，不祇貢獻於香

港，影響在香港；並且貢獻於中國，影響在中國，而香港關元昌一族是最好的例證，關元昌先父關日已於一八三二年在廣州洗禮，應屬倫敦傳道會在華傳教的碩果，其後關元昌的在港子孫，均為倫敦傳道會會友，故關氏一家，與馬禮遜牧師是一脈相承，其家族成員日後的發展和貢獻，與倫敦傳道會（即今日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業師羅香林教授為近代中國著名譜牒學學者，於一九五八年在香港大學發表《族譜所見之基督教傳播與近代中國之關係》一文，提及香港基督教有王元深、胡燮菴、容閔、凌啟蓮、關元昌五大家族，而五大家的子孫，在事業上之成就，不少對近代中國均有影響和貢獻。據近年發現有何福堂、李正高、溫清溪、陳天垣、張聲和等教會家族，對於教會和近代中國均有深遠關係。由於香港早年教會，多在西營盤和中環華人社區活動，信徒往還密切，以信仰關係，教徒互相通婚已成風氣。因此上述各基督教徒家族，多有姻親的關係。《香港開埠與關家》一書的出版，將有助香港教徒人際關係脈絡的探索。

國父孫中山先生於一八八七年在港就讀倫敦傳道會主辦的香港西醫書院，與關景良同學，由是認識關元昌夫婦。關景良礙於父母阻止，未能實際參加孫中山的革命行動，但在言論和精神上是支持孫中山的工作。就本書所見，關氏族人有不少投身革命工作，日後在國民政府擔任公職，為國家効力。是以本書出版，對於孫中山早期在港的活動，以及在澳門、廣州進行的革命事業，可有一種實際背景的說明。

關元昌公枝葉繁茂，發展至今已有五代相傳，子孫人數二百餘人，可稱香港基督教的望族。歷世人材輩出，有醫生、工程師、建築師、實業家、銀行家、音樂家、教育家等專業人士，散居中國、香港、台灣、美國、加拿大、澳洲、新加坡、英國等地，從事社會和教會的服務。更有不少熱心信仰的子孫獻身傳道，或在教會擔任義工，是上帝對關元昌族人的祝福。若論關氏一族之成就，以醫生最為傑出。自關元昌為中國第一位牙醫以後，每世皆有醫生，於今總計不下三十餘位，從歷史所見，關氏一族可稱為「中國西醫世家」。

基督教在華傳教，所興辦的事業有傳道、教育、醫藥、出版各類，近年中外學者對中國基督教發展經已興起研究熱潮，不少專書和論文業有出版。但所可惜對基督教醫藥事業的研究，則較少論著，此因一般學者對基督教在華的醫藥事業和人事發展少有認識，故此「香港開埠與關家」的面世，實有助中國教會醫藥史的研究。

關肇碩醫生是香港著名鐳射學醫生，而他對於祖父關元昌公一族的发展向表關心，歷年搜集族譜、文書、資料、圖片；又得內姪東京亞細亞大學教授容應萸博士撰寫本書。關肇碩醫生多年奔勞，致力編印本書，不但顯示關醫生個

人慎終追遠的孝德，其用意亦在於對上帝的感恩，見證上帝對關氏族人的眷顧和祝福。

一九九七年是馬禮遜牧師來華傳教一百九十周年的日子，亦即基督教來華傳教一百九十周年歷史性的時刻。關元昌一族的蒙福，與馬禮遜牧師來華傳教關係最為直接。本書出版不但對馬禮遜牧師的一種紀念，更是說明基督教在華傳教一百九十周年在醫藥貢獻的一種成果。

李志剛謹序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日

於香港銅鑼灣禮賢會堂

香港開埠與關家

——基督教之傳播與關元昌一族

容應萸

「吃教」與「崇洋」

在近代中國歷史，信奉洋教（包括基督教的新舊教）名為「吃教」。鴉片戰爭以後，根據不平等條約的規定，洋教獲得在中國傳播的權利，但中國社會一般並不接受它，從懷疑到反抗，發展到義和團，庚子賠款，辛丑和約。基督教信徒，則被加上「洋奴」「假洋鬼子」等烙印。民國時代基督教轉而吃香，成為帶來新思想，新知識，新教育的媒介和橋樑，「崇洋」不再可恥，部份教徒更一躍而成為新社會統治階級的中堅份子。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內學者一般只引用馬克思主義來評價基督教及其有關的人，事，和物，因此視之為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國土上進行文化侵略的工具。教徒被看作一羣對帝國主義存在幻想，尋求基督教庇護的投降主義者。當然這些尖銳的批評並非毫無事實根據，卻只看到歷史的片面而失之偏頗。到了最近七、八年，改革開放提供了新的學術環境，國內出現以客觀的態度來探討基督教的入傳中國以及中國教會大學史的新趨向。

事實上，基督教自清季在中國傳播，其信徒在傳統社會中，形成一個新的精英階層，這個早期的基督徒階層，不只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近似的教育和文化背景，更在血緣，地緣，婚姻紐帶方面有連帶關係。這個階層對推動近代中國的各方面的改革運動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只是改革的結果卻造成這階層不可避免的擴散。

這本小書，通過分析最早期的香港基督徒關元昌的經歷及其一族的發展，以探討基督教傳播與香港的發展以及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關係，並重新為基督徒在中國現代化所扮演的角色定位。

關氏一族的源流

根據一九三七年關景燊，關頌聲，關蕙馨等合編的《關氏家譜》^①，關元昌一支的關氏，原居福建建寧。宋朝有關肇治，十八歲上京赴考合格，在京任官七年多後，因在朝上犯了輕微不禮貌之舉，被貶岡州（今新會縣）。肇治在岡州六年，政績昭卓，因而得以恢復原職位。退休後，肇治選擇岡州屬談雅里作安享晚年之地，在廣州城小馬站建祖祠，其子孫遂為粵人。肇治享年七十二。

肇治謫守岡州時，其兄長隨同遷入廣東，長兄肇基定居南海九江，次兄肇裘則定居於順德黃連。事實上關氏族人繁衍各地，但由於肇治是由福建遷入廣東之第一人，廣東之祖祠又是由他所建，廣東關氏族人尊他為第一世。至十四世有名關翺號悅隆者為逃避土匪入侵，携同兩子文祐，禮祐移居番禺西塱鄉，遂為番禺關氏之始。關元昌是關翺所傳之十八世孫。關元昌一支由十八世起，命名取自番禺祖祠門前對聯：

「學校本明倫宜序英耆崇教養

國家同立政端從孝友建勳猷」

由右而左順次取一字作命名之首字，故十八世取「學」字，十九世取「國」字，二十世取「校」字，由此類推。其用意是俾後人可從族人名字中察知其世系。

關元昌（1832—1912）

關元昌是甚麼時候成為基督徒？劉粵聲編《香港基督教會史》所載關元昌的個人傳記裏云「當前清咸豐年間，去基督教入華之時日未遠，人心閉塞，與香島開設之初成正比，而公能從其先君後，皈依基督，竭力慈善事業」^②。這是說關家是從元昌父親一代便開始信基督教的。

一七九五年英國幾個教會（公理會，長老會，聖公會，循道會）成立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以此作為聯合向海外傳道的機構。一八〇五年倫敦傳道會決定派傳教士到中國，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立刻開始學習中文^③。當時清政府嚴禁外國人進入內地，而操縱英國到中國交通的東印度公司亦不願意乘載傳教士，怕影響與中國的貿易，馬禮遜要在中國傳道，可真是困難重重的。結果馬禮遜繞道美國，橫渡太平洋，於一八〇七年到達廣州，秘密寄居在一個美國貨倉裏，繼續學習中文和中國生活習慣。之後他遷居澳門，於一八〇九年和一位莫小姐結婚。這時他開始任職於東印度公司作中文翻譯，才可以職員身份合法往來澳門與廣州，不會被清政府驅逐出境。他在從事工作的同時，獨力翻譯聖經和向中國人傳道，直到一八一三年，才有米憐（Milne）從英國被派來協助他。

一八一四年，馬禮遜在澳門為幫他做印刷工作的蔡高洗禮，這是他收到的第一個信徒。但由於清政府和東印度公司對他的行動不滿，他被迫轉到馬六甲求發展，也把倫敦傳道會在東方的本部遷去。在馬六甲他繼續翻譯聖經和撰寫介紹基督教義的文章。一八一六年另一個幫他做印刷的梁發在馬六甲接受洗禮。梁發是廣東人，據說他曾受僱雕刻米憐的著書，因而受影響；他在一八一五年隨米憐到馬六甲，並由米憐為他洗禮。一八一八年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教育當地青年華人子弟。一八二二年米憐病逝，梁發返中國傳教。

馬禮遜在當時已完成新舊約聖經的翻譯，又編好一本英華字典，有意返英國一行；另一方面，廣州及澳門一直未有人代替他的傳道工作。所以他立梁發為中國第一個牧師，自己於一八二四年返英國。一八二六年馬禮遜再度回到澳門，由於官府非常注意他的行動，他不能公開傳道，便集中從事著作。梁發則一邊向鄉人佈道，一邊著書，還創辦了一間私塾。一八二八年梁發第一次為一個同鄉少年洗禮，一八三〇年，梁發的印刷徒弟屈昂受洗，屈昂後來還成了梁發的助手。一八三二年梁發向倫敦傳道會提交的報告說當地差不多有十個信徒^④。為了要吸收傳統知識份子，梁發模仿向來廣州赴考的生員分發勸世善書的習慣，也到貢院之前派他自己寫的傳道書籍。一八三四年馬禮遜逝世，梁發更加努力傳道，終於引起官府注目而被通緝，但他得美國傳教士裨治文

(E.C.Bridgman) 之助，逃亡到馬六甲，他的助手數人也先後逃到馬六甲，造成所謂一八三七年的馬六甲黃金時代。值得一提的是，被梁發在考場前分發的「勸世良言」所感動的人物之中，洪秀全也在內，洪在一八四三年創立拜上帝會^⑤。

梁發再度回到廣州，已是一八三九年，鴉片戰爭前夕，馬禮遜之子是當時英國駐廣州領事，梁發之子梁進德則擔任林則徐的英文翻譯^⑥，可是個人友愛關係的力量無法阻擋時代的洪流，戰事在翌一八四〇年爆發。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中國被逼開廣州等五港通商，割讓香港作英國殖民地，也驚醒了在酣睡中的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然而，對基督教的傳教活動而言，因為南京條約保障傳教自由，一掃過去各種障礙，造成一個空前發展的機會。一八四三年，倫敦傳道會決定把其東方本部以及英華書院，從馬六甲遷到香港，而當時英華書院的校長就是理雅各 (James Legge)^⑦。

雖然從現在可見的各種文獻和記錄中找不到關元昌的父親關日 (字允著，1797－1863) 受洗的記載，但從年代以及下述關家和倫敦傳道會的關係來看，關日應該是梁發在一八三二年給倫敦傳道會的報告內所提及的十個信徒之一。馬禮遜從一八〇七年來華二十五年，至此只得十人領洗，可知當年基督教傳道工作的開展是何等困難。至於關家和早期香港倫敦傳道會的關係，可見於《關元昌公家譜》之十八世學榮小傳。學榮 (1935－1901) 號節堂，關日之四子，即元昌之弟。這小傳載有倫敦傳道會執事所誌的墓銘：

「關節堂先生乃倫敦傳教會長老也。韶齡隨父兄到港，受業於英國理雅各牧師門下。學成，即就國家后皇大書院之聘，膺助教一席者三十餘年。……先生昆仲四人，長三均任本會長之職。由其尊人熱衷愛主，家訓有方，故先生外有道德之師，內有誠信之父兄……。」^⑧

由此可見，關日於鴉片戰爭前在廣州受洗，香港割讓後，他帶着一家人到香港。離鄉別井的原因很可能是關日一家信奉基督教，不容於鄉人而受到排斥。抵港後小兒子進倫敦傳道會理雅各牧師從馬六甲遷港的英華書院，畢業後則在理雅各於一八六二年創辦的皇仁書院任教凡三十數年。皇仁書院是香港第一所官辦學校，但卻是由理雅各所倡立和辦理的，首先被命名中央書院 (Central School)，一八八九年改名維多利亞書院 (Victoria College)，一八九四年再度改作皇仁書院 (Queen's College)^⑨，應該就是墓銘言及的后皇大書院。墓銘又云：「當時海禁初開，中西要津，需譯人正切，同門友多由此致富貴，而先生淡榮利，安儒素，其高尚之志，有非平常所可及。」學榮從就學到就業一直是在倫敦傳道會的事業範圍內，對該會貢獻良多，後來更出任該會長老。至於他其他三兄弟均任該會長老的事實，正明確地指出關家和倫敦傳

道會的密切關係。

關元昌和倫敦傳道會的關係始於何時？現存的關元昌傳記有兩種。一是上文提到劉粵聲編《香港基督教會史》內的個人傳記《關元昌》；另一是《中國近代牙醫始祖：關元昌翁暨德配黎氏夫人略傳》¹⁰。兩者內容稍有不同，但都是極其重要的資料。前者的《關元昌》傳記云：

「嗣倫敦會創設印字館，公乃辭醫院之役，廁身手民，嫻習印刷務，旋以所入不足供家人溫飽，轉從美國哥倫士醫生習牙科。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卒業，回粵問世，為粵省牙醫之濫觴。現世業此道者，胥以公為鼻祖。寓省十餘載，復回港，而兒女次第長成，俯仰已足，無內顧憂。公之居港也，為理雅各，丹拿兩博士所器重；寓省則與湛約翰博士，梁柱臣同勞傳道，戮力會務，故粵港兩地皆舉之為長老也。先是倫敦會大石柱堂，第二次遷築時，公一身任督役，勞瘁不辭，有暇輒與宗人譚真道，善感善引，多被翕化。」

後者的《牙醫始祖》一文則這樣記載：

「其時傳教士復在香港開設英華書院，內部工作分為傳教，醫務，翻譯聖經，印刷等四項，元昌翁即由傳教士介紹赴港英華書院工作，以作事勤謹，年少聰慧，為叻士醫生賞識，選為學徒，從其習藝，授以西法鑲牙技術，不數年盡成所學，手術嫻熟，繼續在院服務，凡十餘年，翁以經驗所得，發覺齒病影響人之健康極大，時穗垣尚未有牙醫館之設，遂於西曆一八七〇年舉家遷穗，卜居西關光雅里，並就其寓開設牙醫館，本其所學及經驗問世，創我國人西法鑲牙之先聲，執業垂廿餘年，迄其哲嗣相繼在社會服務，始告休養，復回港居住，以終餘年。」

英華書院於一八一八年首創於馬六甲，目的是「培育華人宗教青年，為協助廣傳福音之用」¹¹，一八四三年由理雅各將該校遷港。倫敦傳道會在香港中區購入一棟房子，樓下用作傳道會辦事處，樓上便是英華書院。在香港初期，由於未建有教堂，英華書院是教友聚會場所；而工作方面，除教學外，如《牙醫始祖》一文所述，還包括傳教，醫務，翻譯，印刷四項。自馬禮遜，梁發時代開始，印刷可說是基督教傳道中最基本和重要的一項工作。事實上，最早期信徒的蔡高和梁發等，都本來是印刷助手。而英華書院在校內設印刷場，自製銅模活版，現存的同治三，四，五（一八六五—一八六七）年版聖經，就是在該處印訂的¹²。至於醫務方面，則由馬禮遜的女婿合信醫生（Benjamin Hobson）主持西醫贈診所，由信徒趁機向候診的病人傳道。¹³《牙醫始祖》一文說關元昌抵港後在英華書院工作，而《關元昌》傳記則記述關元昌先在某醫院做工，倫敦會印字館成立後轉職印刷務。這醫院是否合信醫生的贈診所不得而

知，但倫敦會印字館無疑就是英華書院內的印刷場，關元昌就是在此工作。

關元昌是在甚麼時候開始從印刷改習牙科？他是師事哥倫士醫生還是叻士醫生？又抑或兩者是同一人物？還有，叻士醫生是否和英華書院的西醫贈診所有關係？這些疑問現在都已不可考。再者，道濟會堂張祝齡牧師認為元昌是在由西教士於一八三五年在廣州設立的博濟醫院學牙科，但也沒有確實的證據^⑭。可以說的是，關元昌離開印刷務之後在香港和（或）廣州習西式牙科，學西式鑲牙技術，然後於一八七〇年遷回廣州執業，子女稍長後再回港定居行醫。據說元昌是第一個華人註冊牙醫，有「中華牙醫鼻祖」之稱譽，他選擇在廣州開業，是爲了要方便下鄉傳道活動^⑮。不過，正如《牙醫始祖》一文所記，關元昌改行牙醫以後，來往省港兩地，熱心倫敦傳道會會務，《關元昌》傳記所提及倫敦會大石柱堂的第二次遷築，就是指一八八八年道濟會堂的落成。

最早時期，倫敦傳道會的教徒在英華書院聚會，後來雖有一八四五年由中外教徒聯合籌捐，俗稱大石柱堂的愉寧堂（Union Church）建成，但這教堂除了每星期日下午的粵語聚會以外，均以英語舉行，因此華人教徒不免有借用該堂之感。梁發轉往廣州活動後，一八五二年湛約翰牧師被派來協助理雅各。一八五六年理雅各出任香港政府開辦的中央書院校長，英華書院可能因爲接辦乏人，遂告停辦，而華人教徒改到牧師家裏聚會。一八七〇年代，華人教徒增至二百餘人，自立意識日濃，而倫敦傳道會向來亦主張各地區教會自立，遂於一八七六年成立「華人自理會」。然而要達成真正自理，需要有屬於自己組織的華人牧師和聚集據點。牧師方面在一八八四年請禮賢會的王煜初牧師出任，聚會場所則要到一八八七年道濟會堂籌建完成，一八八八年正式啓用後才得到解決，這樣華人自理會終於真正名實相符^⑯。《關元昌》傳記記述由借用大石柱堂到遷入道濟會堂的過程云：「公一身任督役，勞瘁不辭。」

關黎氏（1840—1902）

《關元昌》傳記云：「夫人黎氏為女中巾幗，家事全仗料理，兒女均沐宗教教育」，只是簡單說明黎氏也是一名熱心的基督徒。《牙醫始祖》則對黎氏生平的記載比較詳盡：

「黎氏夫人為南海西樵扶黎鄉望族，當太平天國之亂，其父母絜子女二人逃難來穗，中途中既遭母病亡，復散失其幼弟，父女二人抵達穗垣十三行街時（即今十三行路，昔日全為外國人住宅）囑其女（即黎氏）坐於一大洋樓下休息，即往尋其子，此洋樓即英華民政務司波先生（以前稱波大人）住宅，當波大人外出時，見少女倚門而哭甚悲，即延入內，詢以實情，愛護備至，其父以尋子不獲返睹狀喜極，波夫人即提議留女在家，俾其父得自由往尋其子蹤跡，其父深感盛意，慨然允諾，遂將女留下受波夫人教養，及成長後能治家，而於刺繡編織絨線等技能，無不精巧，迨後波先生遷居香港，遂介紹與元昌翁結婚，共組新家庭，其時香港雅麗士醫院成立，醫務極為發達，婦女踵門求診，日以百計，均感英語隔膜，苦無傳譯之人，因知夫人嫻熟英語，遂聘為傳譯，此為女子善操英語之首，並創女子職業之新紀元。」

詳細檢討倫敦傳道會和道濟會堂的歷史，發覺有一人物和這裏記述的波夫人相符合。有一位英籍的高露雲（Daniel Richard Caldwell，一譯作高維爾）本來是一個傳譯，一八五七年之前升任華民政務司，他的太太是中國人，名叫高三桂（Chan Ayow）。他們大概在一八四五年結婚，而高三桂在一八五〇年受洗禮加入倫敦傳道會，後來參加華人自理會，是一個熱心虔誠的教徒。據說她收留了多名中國人進她家作家人僕從，而這些人大都受她影響而受洗成華人自理會教徒；又有一說她一向喜歡為她收養的家人僕從彼此作媒，安排結婚對象⁽¹⁷⁾。高三桂的丈夫高露雲在一八七九年病逝，高三桂承受了她丈夫遺下的物業房產，包括位於荷里活道與鴨巴甸街交界的一棟房子。當時倫敦傳道會正在物識地點以建立醫院和華人自理會的教堂，在交涉後高三桂同意將該地段以原價七萬圓的半價出售，指定給倫敦傳道會建醫院及華人自理會建教堂⁽¹⁸⁾。一八八七年落成的醫院就是上述的雅麗士醫院（正式名稱是雅麗氏利濟醫院），而一八八八年啓用的教堂也就是上述的道濟會堂。醫院及教堂均由自理會黎福池長老命名，傳教以天道救人，故教堂名道濟，醫院以利益救人，故名利濟⁽¹⁹⁾。

《牙醫始祖》一文所提及到的各事項——關黎氏在少女時代被華民政務司夫人收養，被介紹與關元昌結婚，婚後在雅麗氏醫院工作——除了在姓名上有

波夫人和高夫人的差異以外，都可以說是和高三桂的事蹟相符。無論波夫人是否就是高夫人，高三桂和關黎氏以至關元昌的淵源不淺。雅麗氏醫院百週年紀念特刊《矜憫為懷》的附錄七《護士長及護理主任名單》記載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一年這職位由「關太」出任^{②①}，又第五章介紹該院早期護理情況云：

「一八九一年底，倫敦會派遣史提芬夫人（Mrs. H.Stevens）來院任護士長之職，這是本院第一位有正式訓練之護士。……在史提芬夫人早期的報告中，她這樣寫着『女病房已有一位護士長關太太，這位中國女士非常聰明能幹，但對於護理工作所識不多，她曾訓練一位黃太太作為她的助手……』」^{②①}

該文的英語原文還形容關太比她同時代的人要早出生數百年^{②②}，大概是稱讚她的睿智的意思。這關太無疑就是《牙醫始祖》文中在雅麗氏醫院做傳譯的關黎氏，只是史提芬夫人赴任兩個月後，關黎氏卻因為健康欠佳辭職。

此外，《香港基督教會史》的《文化事業》章，也有關於黎氏與英華女校的記述。英華女校是倫敦傳道會一八四六年在香港辦的第一所女校，也是理雅各創辦的英華書院的姐妹校，由理雅各夫人創立。開辦之時期有學生七人，一八五〇年增至十三人，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五八年校務由湛約翰的夫人擔任，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三年方有盧女士（英文名為 Miss Legge，應該是理雅各的女兒）為助理，並增聘一漢文教員及關黎氏^{②③}。雖然該文指出「關師母不過承名助教，而實任教員乃其第八女公子，即現在之容星橋夫人」，但關家八女要到一八七〇年才出生，沒有可能在此時期擔任英華女校教員，所以當時關黎氏應為事實上的教員。除此以外，還有黎氏曾在香港法院做傳譯之說^{②④}。當時在香港精通英文的華人不多，女性更少，黎氏的存在應該是很有價值的。

關家長女於一八五八年出生，即是說黎氏大約在十七歲和關元昌結婚，他們共有子女十五人（男十女五），十五男生於一八八三年，其時黎氏四十三歲。而婚後初期黎氏曾任教員，一八八七年以後在醫院任傳譯，護士長等職，在當時應是極其稀有的職業女性。一八七〇年代元昌闖家返廣州行醫，因此沒有黎氏在港活動的記錄。至遲到一八八七年，關家再度回港定居，元昌埋頭於道濟會堂的籌建工作，黎氏則服務於新落成的雅麗氏利濟醫院。